

导 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个是理论向度，是指哲学逻辑发展的理论标志，“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另一个是实践向度，是指哲学理论变革世界的实践标志，“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标志，是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的矢量。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所产生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三个里程碑意义的理论标志，与其相对应的实践标志分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具体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得到发展，以时代主题为特征的新的理论形态不断展现出来。新的理论一旦形成，便成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理论正是通过与实践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作用。

马克思说：“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③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始终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21 页。

持着这样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之中。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充分体现了这种结合。马克思是通过经济学的研究，为自己哲学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基础，创立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哲学世界观转变之后，他将这种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继而又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改变整个世界提供了理论基础。可见，马克思是通过经济学发展哲学的，又通过经济学走向现实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之间的中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现实的作用始终存在着。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更是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是由 1978 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的，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哲学问题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支持。之后，人们的思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哲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及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后来又相继发生过两次思想大解放：一次是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另一次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认识。这两次思想解放都发生在经济领域。为此，有人认为，哲学不再有昔日的辉煌，哲学失落了。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以为哲学对我国经济建设及理论研究的作用始终存在着，只不过无需时时、处处贴上哲学的标签。其理由有二：其一，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又是我们现在及将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邓小平理论本身就是以哲学理论的形态体现的。其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哲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少问题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仅仅凭借经验科学的知

识是难以解决了。因此，对于那些关系我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及其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关键不在于进行经济学论证，而是要进行哲学的反思和回答，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哲学是超功利的，哲学对现实实践所发生的作用，是不能按照利益原则进行衡量的。

“经济哲学”是经济学与哲学互动的中介。“经济哲学”的兴起表明，哲学对经济学的作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从经济学的外部深入其内部。可见哲学与经济的互动深化了。不过，目前对“经济哲学”的学科界定，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尚未形成共识。在此，我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我以为，“经济哲学”是“无”与“有”的统一体。我们可以从哲学的本性与社会现实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理解。从哲学本性的层面看，“经济哲学”不属于哲学本义之哲学，它不过是经济活动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或者是经济学的元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鲜明的特性，不是理论本身的自我标榜，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现实实践中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表明，它是直接作用于具体的学科和社会现实之中的。如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还存在一个“经济哲学”，势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插上一道屏障，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高高在上，对具体的学科和社会现实不能发生直接作用。显然，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而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具体学科和社会现实的过程看，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都将会出现“××哲学”，这样，有多少个学科，就会有多少门哲学，哲学泛化了，泛化的结果便是哲学之无。一切知识、一切社会实践都充满着哲学的道理，但这并不等于说，一切学科都是哲学。所以，从根本上看，“经济哲学”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社会现实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今天，“经济哲学”却如此凸现着，成为经济学界和哲学界的热点。逻

辑与现实是如此地对立着。我以为，我们应该从社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角度去分析、理解这种矛盾现象，因为哲学对经济学的支配或影响作用，是通过经济理论研究的主体，即研究经济理论的人，作为中介来实现的。经济理论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经济理论研究的主体在从事研究活动时，必定要借助于概念、范畴和规律等思维形式，必定要借助于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等思维方法。如果没有哲学提供的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甚至连两个最简单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更谈不到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认识。可见，经济研究主体的哲学素养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研究主体对同一经济现象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曾说过：“经济理论上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①马克思之所以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一个重要的理论张力就是来自于哲学，即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处处闪烁着哲学的光辉，而他的哲学理论中又处处充溢着经济思想的精华。马克思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当然，我们不能期盼每一个主体都能达到马克思对哲学与经济学兼备的素质。从我国的现状看，各门学科的联系甚少，“隔行如隔山”；又由于我国整体哲学素质还不高，人们远没有达到对哲学理论的自觉运用，而且这种状况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得到改善的。这就为“经济哲学”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客观依据，通过“经济哲学”这个过渡性学科提供经济学所需要的“哲学”和哲学所需要的“经济学”。因此，“经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这个历史发展是由主体对哲学的自觉程度的发展决定的。当人们自觉地掌握哲学这个“工具”，自觉地将其应用于具体研究与实践之中，达到哲学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经济哲学”的历史使命

^① 《哲学研究》1987年第8期。

便完结了。因此，“经济哲学”是“有”与“无”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历史、现实与逻辑的统一。“经济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充分体现着辩证法。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正在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怀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感受，我将博士论文的选题指向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处。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及自己所进行的资料收集和知识准备，我将博士论文的主题定格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哲学分析上。在论文构架的考虑上，纵向跨度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至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对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横向分析、评价的重点是经济运行模式（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制度。在写作方式上，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为背景，以论为主，史论结合。进行分析时，不局限于经济因素本身，力求从整体上作全面的分析。特别通过对改革开放的前后比较，进行具体地、历史地、客观地分析与评价。贯穿全文分析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就是，整体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在具体结构安排上，全文分为四大部分，首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探索进行总结；然后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对经济体制及其转变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最后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走向是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

第一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探索。从全文总体结构看，这一章是一个纵向分析，但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历史编排，而是依照革命与建设、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作用、“以阶段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个问题，对历史进行的哲学分析。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目的在于启示现实，展望未来。

第二章，社会主义矛盾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矛盾理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才会产生阶段论、本质论。矛盾论、阶段论、本质论有着内在的辩证联系。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只有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正确判断，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形成社会进步的动力。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界定不仅要着眼于社会主义最高目标，更要着眼于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把握，不仅在于其表层话语，更在于其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全面地理解。

第三章，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评价。本章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产生、发展，直至被市场经济所代替的历史过程，进行唯物辩证的分析与评价。传统计划经济的优势与弊端，都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言的，离开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评判，是没有意义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败，其主观原因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没有坚持社会历史辩证法。“计划经济终结”是指传统计划经济的整体构架，而不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与实践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两种不同水平的计划经济，二者是有区别的。必须区分阻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不能笼统地将改革开放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传统计划经济模式。

第四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必然选择。本章从哲学角度论证了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不是一种主观选择，而是一种历史选择，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可以结合的。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盲目性进行了批判，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未对市场机制完全否定。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看，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必须纠正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错误的思维定势。市场经济功能与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着逻辑关联，这就是它能促进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市场与

计划的结合，因为这种结合是市场体制下两种经济调节手段的结合。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关系。效率仅仅是手段，公平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

第五章，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本章通过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发展的历史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有一个不完善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是以辩证发展的方法去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生、发展过程的。作为一般方法的辩证发展方法，同样适用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产生、发展的分析。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人们常常违背了这一根本方法。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影响着我国传统公有制结构及其形式的选择。我国过去选择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内在逻辑建构的反映。邓小平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逻辑，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唯物辩证地考察，区分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对具体制度进行改革。本章还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方式进行方法论提升，提出了中介分析方法和中介思维方法。

第六章，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发展的历史表明，片面的物质发展与片面的精神发展，所导向的必然是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决不是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最重要的现实基础。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论，也是一种社会文明的新形态。它不仅指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而且还指精神文明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因为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总和。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探索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封建文化，但是，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辉煌却已风光不在，一再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自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之后，中国历史被强行纳入由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体系之中，由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无数志士仁人孜孜不倦地寻求强国富民的道路，然而，中国并未如人们的期望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通向现代化的新道路，鼓舞着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人民以全新的视角展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前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彻底告别了上百年屈辱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便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先进的制度保证。现代化进程具有一般的规律性，特殊的国情又导致特殊的抉择，从过渡中起步，由工业化开始现代化……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扬起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风帆，开辟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天地。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便领导中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拉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序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进行了艰辛的历史探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尽管我们已经自觉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

但是，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上的自觉尚未达到，因此在实践中还未获得真正的自由，还处于一种自在状态。邓小平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之上，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不仅以往建设中的成果为今天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以往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今天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探索未知必然王国的认识基础。历史是一面镜子。因此，对以往社会主义建设所进行的历史探索进行总结、反思，更显得具有现实意义。

一、革命与建设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与建设的地位是不同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是中心，建设是为其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建设是中心，革命则是为其服务的。而且，革命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也是不同的，战争、改造、改革等都是革命的形式，可见，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革命赋予了新的内容。革命与建设并举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创造，是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原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

1. 革命与建设并举

革命与建设并举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以为革命战争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认为这种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毛泽东说：“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

能有保障。”“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①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②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毛泽东还对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③关系进行了辩证地分析。他说：“在现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④这是因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军事，而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⑤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⑥上述表明，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革命与建设并举，并非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在革命这个“中心”基础上的并举，离开当时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不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进行经济建设是不现实的。而当革命取得成功之时，毛泽东则提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

③ 《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而“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①因此，对革命与建设并举必须进行全面地辩证地理解与把握。

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为全面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革命与建设并举的方针，这时革命的内容与形式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这是由我国建国初期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客观状况所决定的。

从旧的生产关系方面来看，有这样四个特点：其一，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关系的侵入。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领土，强迫签订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控制着我国的海关、铁路和航运事业等，控制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并在我国开设银行、兴办工商业，从中国攫取了惊人的利润。而且他们利用特权向我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使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控制着我国的财政经济命脉的同时，还操纵着我国的内政，从而使一个独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二，封建生产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后，从自身利益出发，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中国原有的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因此封建生产关系得以保留，并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剥削结合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6、1428页。

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①可见，中国又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其三，官僚资本生产关系。在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居于统治地位。“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中国买办的萌芽，他们依附于外国在华资本，为其经济掠夺活动服务，19世纪末，一个买办阶级在中国土地上已初步形成。^②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有了显著的增长，并且出现了朝着金融业发展的趋势。1927年之后，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则是官僚资本发展的顶峰，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③因此，中国的官僚资本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封建性和军事性，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四，民族资本生产关系。在旧中国，在外国列强在华资本、封建势力及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民族资本的产生是十分微弱的，无力与其竞争。民族资本资力薄弱，大量负债，其中有80%以上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时，民族资本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而且主要又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与官僚资本相比较，民族资本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而官僚资本却畸形地膨胀。

从生产力方面看，在旧中国，我国社会经济落后，物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察。从工农业生产所占比重方面看，1949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8、630页。

吴序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30.1%，近代机器大工业产值占 17%，农业和手工业则占 83%。另外，在工业生产中手工劳动仍占很大比重，机器大工业所占比重很小。从产业结构方面看，旧中国工业结构是畸形发展的。消费资料的生产占很大比重，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很低，1949 年，全国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73.6%，而重工业产值仅占 26.4%。从工业技术水平方面看，旧中国的工厂多半是资本少，设备简陋，技术水平很低。拿机械工业来说，可以说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机械制造业。从工业布局方面看，工业布局极不平衡、极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偏集于占国土面积不到 12% 的东部沿海的狭长地域。从工业产品产量方面看，旧中国主要工业产量很低，尤其是重工业产品，大大低于美国，甚至与印度相比也不如。接下来，从农业生产方面看，旧中国有 80% 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但都是以个体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经营，没有机械化农具，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到 1949 年，粮食年产量只有 2162 亿斤，棉花不到 889 万担。从科技、教育方面看，旧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当时先进的国家，机械制造、地质勘探、建筑安装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手段极其微弱。当时中国的教育状况也非常落后，1928 年至 1947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为 18.5 万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极其缺乏。

上述可见，旧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反动的，国家整体物质生产力水平又是十分低下。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坚持革命与建设并举，即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恢复经济，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首先着手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其基本纲领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53 页。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通过上述纲领的实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发展壮大，从而确立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1952年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4.7%上升到56%。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从无到有，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48.7%下降到1952年的30.7%。而且，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和其他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业，以及绝大部分的银行业务和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代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其次，在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的同时，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经过三年的奋斗，到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15%，平均每年递增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平均每年递增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平均每年递增15.3%，而且国民经济生产构成起了很大变化，1952年与1949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30.1%上升到43.1%，现代工业产值占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7%上升到26.6%，重工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4%上升到35.5%。可见，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而且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我国的工业化是同步进行的。

旧社会生产关系的改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随着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迅速增长，城乡间正常的物资交流已经实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的方法获得一般利润，其惟利是图的本质及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逐步暴露出来，试图通过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针对这种严峻的情况，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在党政机关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

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是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新社会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带有浓厚的旧社会的痕迹，加之一些干部没有真正理解革命性质的转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逐渐滋生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思想，国家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因此，一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便是必然的了。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提出：“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通过“三反”运动，改造了国家机关，树立了新的社会风气，保持了党的清廉，为新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初，“五反”运动开始了，“五反”运动是一场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的斗争。不法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向执政的共产党进攻。为此，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和指导下，“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文中提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通过“五反”运动，打击取缔了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从而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尽管“三反”、“五反”运动在进行过程中，存在着方式、方法上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经过“三反”、“五反”运动，锤炼了干部，积累了经验，掌握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情况，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

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政治、经济及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生产力得到解放，国民经济得到新的发展，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经济。不过，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其主要表现是：在农村，虽然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但还未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而且，农村仍然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水平低下，生产技术落后，生产资金缺乏，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及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开始出现新的贫富分化。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这个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逐步尖锐化。而且，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以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越来越明显。因此，要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矛盾，也就是说，必须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53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路线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括为“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1954年9月，这条总路线又为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所接受，把它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明，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着革命与建设并举的方针。当然，这里的“革命”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它把“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这个转变的任务合而为一，同步进行，要求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互相适应、协调发展。这条“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

实现三大改造、解放生产力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两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奠定物质基础。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改造个体农业及手工业，将它们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时，社会主义改造又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必须紧密结合，并举进行，才能保证达到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

2. 从革命与建设并举到“继续革命”的歧途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知道，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从 1953 年开始，及时制定并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基本建设、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都提前达到了“一五”计划规定的指标，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由于受到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鼓舞，在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随后便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为党和国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相适应。1956 年，中共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解放生产力”转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来的决策。因此，总路线的提出与工作重